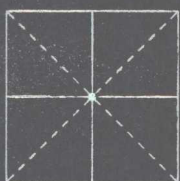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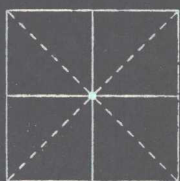


诗

探

索



2020

.. 2 .. 理论卷

主编 / 吴思敬

诗探索

2010 第二辑

理论卷

主编 吴思敬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探索. 2010. 第2辑. 理论卷/吴思敬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08-0543-1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诗歌-世界-丛刊
IV. 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3891号

诗探索 2010 第2辑 理论卷

作 者 吴思敬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43-1
定 价 50.00元 (全二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10-51-C1-89(总书)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任：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桃洲 杨匡汉
陈旭光 林莽 谢冕
潘洗尘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吴思敬

通讯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83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E-mail: Poetry_cn@163.com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 潘洗尘

投稿邮箱：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洼路29号楼1907室
《诗探索·作品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E-mail: jhtbook@126.com

理论卷特约编辑：王士强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2007年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2010年后，每年出版4辑，每辑定价50.00元（含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35号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100037 联系人：顾杰明 联系电话：010-68992190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诗歌刊物研究

4 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徘徊

——初创期的《诗刊》研究……连 敏

26 重返历史现场

——吴家瑾、白婉清、郑苏伊、尹一之、闻山、王恩宇访谈……连 敏

// 诗学研究

42 悠长的女声：另说中国诗歌传统……张 耳

// 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48 窗中·风景

——叶维廉诗歌的存在之思……张志国

69 叶维廉现代诗中的古典元素举隅……叶 焜 孟 泽

75 论叶维廉的诗形观及创作实践……王 珂

87 叶维廉诗学品质简论……蒋登科

// 结识一位诗人

- 104 在黑夜翻越高过腰身的围栏
——论江非……霍俊明
- 122 时间是如此的无尽
——读江非的《草莓时节》……符力
- 126 我们都在孤独地等待
——读江非的《花椒木》……徐南鹏
- 130 时间的孩子……江非

// 诗歌讲坛

- 134 彭燕郊的诗与诗学……孟泽 陈太胜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174 解开或创造“惊讶”
——西渡诗论集《灵魂的未来》阅读札记……颜炼军
- 186 纵贯中西的神性探索
——评马永波《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卢桢

// 诗歌翻译研究

- 194 述论穆旦诗的英文翻译……北塔
-

编者的话

本辑《诗探索·理论卷》新开辟了两个栏目。一个是“诗歌刊物研究”，一个是“诗歌讲坛”。

尽管当下网络诗歌空前繁荣，作为纸质传媒的诗歌刊物依然占据着诗坛的中心位置。诗歌刊物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与诗人的精神风貌，既是诗歌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保存诗歌经典的宝库。诗歌刊物研究是诗歌史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诗探索·理论卷》特开辟“诗歌刊物研究”专栏，其研究范围不仅包含当下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而且包括现代诗歌史上曾经出现的刊物，也包括有重要影响的民间刊物。本辑我们发表了连敏的《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徘徊——初创期的〈诗刊〉研究》，是作者对早期《诗刊》面貌的重新构建，对于研究那一阶段的文学史和诗歌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还发表了连敏对当年《诗刊》的编辑及作者的采访，这些编辑与作者均已高龄，有的已经去世，这使这组面对面的访谈显得弥足珍贵。

“诗歌讲坛”是本刊新开辟的另一个专栏，拟发表有关诗歌讲座、课堂讨论的实录。这类的文字现场感强，生动活泼，既含有丰富的知识信息，又可展现讲授者的个性与风采。本辑发表的孟泽与陈太胜的《彭燕郊的诗与诗学》，是据他们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诗歌课堂的实录整理，不仅能看出这两位教授的风采，而且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也是对彭燕郊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叶维廉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一直持续到世纪初的今天，共出版诗集《赋格》、《愁渡》、《雨的味道》等10余种。与其广为人知的学术著作《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等相比，他的诗歌创作似乎未

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2008年3月在北京联合主办“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海内外学者、诗人近40人与会。我们特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选发了张志国、叶焯、孟泽、王珂、蒋登科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叶维廉诗歌的世界性视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美学取向，有助于展示诗人叶维廉的独特风貌，也有助于对学者叶维廉的诗学研究的理解。

江非是“70后”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作多以故乡平墩湖为背景，在其乡村表述中，揭示了深切疼痛的生存体验和历史记忆。近年江非由山东来到海南，他的诗歌又有了新变，这是一位成长中的值得期待的诗人。在《结识一位诗人》专栏中，我们发表了霍俊明的《在黑夜翻越高过腰身的围栏——论江非》，透过对诗人近距离的观察，描述了江非的创作历程及所达到的诗学高度。符力和徐南鹏的文章则对江非的两首代表作《草莓时节》和《花椒木》作了精当的点评。江非在《时间的孩子》中坦述了他的诗歌观：“诗是人通过时间对于人类灵魂的认识和个人灵魂的塑造。”

诗歌翻译，尤其是把汉语诗歌译为外语诗歌，对中外诗歌交流与传播中华文化是极有意义的。本辑的《诗歌翻译研究》发表了北塔的《述论穆旦诗的英文翻译》，这不仅是一篇研讨诗歌翻译技术的论文，而且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穆旦诗歌从1970年代前到新世纪初在海外传播的一个侧影。

// 诗歌刊物研究

// 诗学研究

// 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 结识一位诗人

// 诗歌讲坛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诗歌翻译研究

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徘徊

——初创期的《诗刊》研究

连 敏

1957年1月号至1957年6月号《诗刊》上发表的大部分诗作在当时及后来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展示了《诗刊》初创的成果，也昭显了《诗刊》在“双百”方针政策下弃旧图新、大胆开拓的勇气和决心。为何这样一个专门性的诗歌刊物会出现在1957年？这种看似偶然的背后蕴藏的历史必然性何在？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来自社会、诗坛、诗人等等群体的或个人的力量如何推动并促成了《诗刊》的最后诞生？

要呈现《诗刊》的创立过程，势必要求将它还原到一种历史情境中去，把《诗刊》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在政治权力与诗歌观念主导下，通过诗人、政府力量、民间组织等多种因素建构出来的刊物，换言之，《诗刊》是在一种意识形态化形塑的过程中历史地完成的。在可资参考的回忆资料中，“党的关怀”以及“毛主席诗词的发表”是关注的焦点，这反映出《诗刊》从创刊之初就体现出党的意志。同时，在创刊号的文本中还可以看到《诗刊》为追求诗歌的艺术性所做的独创性的努力。在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影响下，在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诗刊》建构起自身公共性与创造性共存的双重性品格，它的形成过程既表现为一种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诗歌文本得以展开的自然顺序，也表现为各种文学观念、审美成规、心理机制等的逻辑性构成。

一、《诗刊》的诞生

关于《诗刊》创刊的经过，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臧克家的争取^①，有人回忆是徐迟的积极倡议^②；有人记录《诗刊》创刊之初给毛泽东写的约稿信是徐迟按冯至的建议起草，最后由吕剑用毛笔抄正^③，而有资料显示当年的约稿信确实出自臧克家之手^④。为何时值今日《诗刊》的创办细节还引起那么大的

①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②周良沛：《又是飞雪兆丰年——忆徐迟于〈诗刊〉，创刊前后》，《难忘徐迟》，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220页。

③谢克强：《同志仍需努力——著名诗人徐迟同志访谈录》，载《诗刊》1997年1月号。

④国家档案局查到手书原件，证实是臧克家笔体。由刘福春提供。

波澜？这些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刊》诞生的不同凡响以及把毛泽东列入作者队伍的重大意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刊物的一些细部问题终未有个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中，《诗刊》作为第一家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其意义与影响均是其它刊物所无法取代的。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办的？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刊物的编辑成员由哪些人组成？它的诞生为刊物今后的个性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弄清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重返《诗刊》具体情境的关键。

1. “回忆录”中的叙事

现在研究《诗刊》创立这一历史事件，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料在《人民文学》中有所反映：“‘诗刊’是一个诗歌月刊，定于1957年一月在北京出版，它的任务是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之下，繁荣诗歌创作，推动诗歌运动。它的内容包括：诗创作，诗翻译，诗的理论批评，诗歌活动报导等等。它将是全国诗歌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共同园地。‘诗刊’分道林纸本、报纸本两种，25开，100面，并有精美插图。报纸本每期定价3角。现已开始预征订户。”^①这则简单扼要的讯息主要充当了广告的功能，而关于创立更具体的内容大概只有借助于当事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回忆录。这些当事人在叙述几乎时隔半个世纪的《诗刊》创立这一历史事件时，都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党的关怀”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毛主席诗词的发表”引起的强烈反响。其中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编辑部成员沙鸥、吕剑、白婉清、刘钦贤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②这些回忆录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出入，但几个重要方面却基本一致：

第一，《诗刊》创刊的决议产生于1956年这个“好年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文艺杂志的创刊之势犹如雨后春笋。第二，创办《诗刊》的想法得到当时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支持和帮助。第三，编委、编辑成员的分工，大致为臧克家统帅全刊，编辑部工作由沙鸥、徐迟分管半年，编辑组由吕剑、唐祈、吴视等组成，刘钦贤、楼秋芳两人为编务组成员。第四，毛主席诗词十八首以及一封亲笔信在《诗刊》的发表对于刚创立的刊物来说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显而易见，《诗刊》创立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它的创办不仅合乎民意，而且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帮助。其中臧克家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就很有代

^①见1956年12月8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封底的征订信息。

^②参见臧克家：《〈诗刊〉诞生三件事》，载《诗刊》1982年第4期；《我与〈诗刊〉》，载《诗刊》1994年第5期；徐迟：《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载《诗刊》1982年第1期；沙鸥：《宝马雕车香满路》，载《诗刊》1994年第5期；白婉清：《〈诗刊〉忆旧思今》，载《诗刊》1997年第1期；吕剑：《未完的回忆》，载《诗刊》1987年第1期；刘钦贤：《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伟人》，载《淮风》2004年3月。

表性，他说：

1956年，在京的许多老中青诗友们不时聚在一起谈谈。那时徐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有一天，好几位青年诗人在他的宿舍里碰头了。大家都说，诗歌需要一个阵地，应该搞个刊物才好。我心里想，已经有个综合刊物《人民文学》了，再搞个专业性质的刊物恐怕不成。同时，我接到读者来信，也表示了和大家同样的意愿。大家怂恿我争取一下试试，因为我已经调到作协书记处工作了。我把这些情况向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同志谈了，希望他向领导同志反映一下。不久，白羽同志到我笔管胡同的宿舍来了，说：领导上已经同意诗刊出版了。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真有点出乎意料！于是，我们商讨了编委、主编、副主编以及编辑同志的人选等问题，请他拿到党组去研究、决定。这样解放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刊物《诗刊》就诞生了。^①

臧克家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时与《诗刊》的诞生已是相距37年了，虽然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显得有些泛泛，许多细部问题仍不明朗。比较详细全面为我们提供有关文字材料的，还有一些出自“访问者”之手的回忆文章。比如周良沛在回忆徐迟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诗刊》如何诞生，他的回忆就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现场感”：

1956年2月27日-3月6日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次理事会议，要闭幕的时候，徐迟举手从坐席上站起来发言：中国是个泱泱诗国，建议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创作和评论的刊物，就叫《诗刊》好了。因为这事起先并未纳入提案和议程，也是与会者未曾想过之事，会场上一下为之静场，很快，谁带头一鼓掌，也就啪啪地热闹起来了。第二天，他分别找了作协党组的负责人荃麟和白羽同志，落实他在理事会上，只有掌声，还是热烈的掌声，却没有决议的，关于他那办《诗刊》的提议。荃麟抗战胜利后到开国前夕，都是在香港文委与南方局文委负责，长期活跃在文化统一战线，同徐迟，不仅早在香港就相熟，而且，为反对反动势力对进步文化的围剿，有过多次或明或暗携手合作的友谊。白羽在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工作时就到过徐迟那当时生活得很艰困的家，对他有很深，很好的印象。对于办刊，他们没提出任何意见，完全是热情的支持，认为只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就行了。这期间，沙鸥和吴视在《北京日报》

^①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以副刊形式办的不定期的诗刊，已于10月14日创刊见报了。并以郭沫若作头条的《骆驼》作为刊名。诗的春天，似乎已能听到她走近的脚步声了。而且，作家协会将在11月21日-12月1日召开一个“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①

这些回忆不约而同提到“党的关怀”在《诗刊》创立这一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诗刊》从诞生之初就和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同时这些回忆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无论是“访问者”还是“回忆者”，寻找《诗刊》创立的政治意义构成其叙事话语的内在动力，他们努力凸现“党”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党在当时所具有的强大召唤力，“在党政机构作为中国权力运行中心这个现实环境下，支配社会资源和成员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那些具有‘干部’身份的人群当中。”^②一个刊物的存在与否要经由该单位的领导干部按照党的意志和单位制度的建设精神决定。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诗刊》创始人的现实需求，即通过强调与党的关系，表示《诗刊》的合法性地位。同样地，向毛泽东约稿以及创刊号上对毛泽东诗词发表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的渲染也是《诗刊》政治诉求的深入表现。

2. 诞生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在诗歌史的撰写以及大多研究者眼中，把《诗刊》的创立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加以描写仍旧不同程度地出现，它的意义甚至超过刊物本身。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把它的创立置于一个更为开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上下文中，对其基本动作、符号以及编织其间的人事加以解剖，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一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含义。

首先追溯一下“五四”以来诗歌刊物的生存情况。“五四”前后，很多杂志报纸竞相刊载新诗，刊载最多的是《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但是还没有专门登载新诗的期刊，在文学刊物中，诗歌成了“填补空白”的角色。此后，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诗歌刊物不断出现，总体看来，这些诗歌刊物共同的特点就是：同人刊物的性质，规模小，存在时间短。^③共和国成立后，在新文化体制下，虽然出现了众多文学刊物，但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出现。这种缺席也为《诗刊》的诞生起了催生作用。但是为何发出创办《诗刊》的提议会出现在1956年呢？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的文艺发展。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一年，它提供了建国后第一次难得的最好的发展机

①周良沛：《又是飞雪兆丰年——忆徐迟于〈诗刊〉创刊前后》，《难忘徐迟》，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220页。

②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③吴勝：《五四以来的诗刊掠影》，载《诗刊》1957年2月号。

遇。从经济增长看，经过最初三年恢复时期和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642亿元，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35.6亿元。从1953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递增19.2%。这一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暖人心怀地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办法，并传达和阐发了毛泽东“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①同时，“双百”方针的颁布，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产生了激发作用，文艺界生机勃勃。这一年年底，中国作协专门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集中讨论文学期刊如何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会上主张文学期刊可以自由、平等竞赛，而且允诺刊物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个性。在那一两年间，不仅“新创办的刊物的数量不下数十种”^②，而且按计划“销数还在不断增加”^③。而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之间，“特别是诗，在文学部门，它比之小说、戏剧，常是直接地抒发作者的感受，除长篇叙事诗外，一般地说也比较能够更敏捷地反映社会斗争。……因此，当方针提出之后，首先是诗歌出现了蓬勃的现象。长久被灰尘封闭笔尖的诗人、甚至‘五四’时代的诗人，也都开始了歌唱，不同风格、各种内容的诗歌，逐渐出现，报纸期刊大量发表诗歌及印行专号，这些都正力求与我们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这也正是诗的时代。”^④在这种大环境下，《诗刊》应运而生了。按当时的一位编委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1956年的气候，就不会有《诗刊》，《诗刊》的创刊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吉兆，是文艺界摆脱束缚，走向舒畅的信号。”^⑤

第三，中央级刊物与地方级刊物对《诗刊》诞生的影响。与《诗刊》一样隶属于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刊物还包括《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文艺学习》、《译文》。虽然当代文学期刊普遍的“相似性”已远远超出某一种期刊的“个性色彩”，但身陷体制链条的当代文学期刊也不是没有差异性，只是，这种差异性不表现为独立的主体性，而表现为体制链条中的“等级性”。《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它的办刊定位是以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创刊第一期就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与体现。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

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85页。

②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③《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载《文艺报》1956年4月15日，第7期。

④邹荻帆：《读“诗刊”》，载《文艺报》1957年4月24日，第3期。

⑤吕剑：《未完的回忆》，载《诗刊》1987年1月号。

是毛泽东专门为《人民文学》创刊所题的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是经毛泽东提议由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发刊词》置于内页的文字页首。《人民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艺报》的地位则显得更为敏感、重要。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之后，《文艺报》被作为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继续出版，它的宗旨、任务是反映全国文艺界的状况，宣传、阐述中共在文艺上的方针、政策，评介当代文艺创作，讨论重要文艺问题。《诗刊》的地位自然无法与上述两个刊物相提并论，但争取领导人的青睐以提升刊物的地位无疑是当时的风尚，而且《人民文学》也做出了表率，所以《诗刊》的诞生史上就出现了之前提到的向“毛主席约稿”一幕。

对于地方级的诗歌刊物，照理《诗刊》施行着供给诗歌标准的功能。然而，对于《星星》却是个例外，《星星》之于《诗刊》更有着“前车之鉴”的意味。《星星》于1957年1月1日创刊，14天后便被报纸公开批评了一个月。应该说《星星》是“双百”方针的产物，又为“双百”方针做出了壮烈的奉献。在同年同月25日创刊的《诗刊》自然就提高警惕，对稿件严格把关以避免《星星》的命运。

第四，在一切外部环境都具备的情况下，编辑内部群体的合作和努力最终促成了《诗刊》的诞生。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有47个编辑部的代表参加的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会上曾提出几项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认为刊物应有独创性，有自己的特点。编辑们趋近于一种类乎“同人”或“流派”刊物的设想，“每个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的周围，以这些作家（他们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是一致的）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①可以说，《诗刊》的编委即带有某种“同人”现象。首先观察《诗刊》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的名单：

姓名	出生	籍贯	《诗刊》创刊（1957年）前的经历	职务
臧克家	1905	山东诸城	1930年发表诗作。《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等。抗战爆发后奔赴前线，1942年初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主编
徐迟	1914	浙江吴兴	1931年苏州东吴大学写诗，翻译。1943年担任郭沫若主编的季刊《中原》的执行编辑。1949年后，任《人民中国》杂志《人民日报》社的特约记者，曾两次到朝鲜战场访问。	副主编
严辰	1914	江苏武进	1934年发表诗作，创办《当代诗刊》，1941年去延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文学系任教。解放后，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
沙鸥	1922	四川重庆	1939年发表诗作。在上海和香港与李凌、薛山合编《新诗歌》，1951年至1954年在马列学院哲学班学习，曾在《新民报》、文学讲习所工作。	编委

①《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文艺报》1956年12月15日，第23号。

吕剑	1919	山东莱芜	1938年写诗。抗战开始后，昆明《扫荡报》副刊主编，《观察报》新闻编辑，香港《华商报》副刊主编，《风雨诗丛》编辑，广州《中国诗坛》编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1948年华北解放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任教。曾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编委
袁水拍	1916	江苏吴县	抗战爆发后开始创作。重庆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候补理事，编辑会刊。发表《马凡陀山歌》、《沸腾的岁月》等，解放后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处工作。	编委
田间	1916	安徽无为	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参加《新诗歌》、《文学丛报》编辑工作。建国以来，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副部长。出版诗集《未名集》、《中国牧歌》、《给战士》、《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等。	编委
艾青	1910	浙江金华	1932年从巴黎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1941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解放后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出版诗集《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欢呼集》等。	编委

从表中可以看出，他们均是具有革命战斗经历、编辑经验丰富的“老诗人”^①，都曾经是《大众诗歌》的编委或作者，有过合作的经历^②。如果按照诗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划分，这几位编委是“作为新诗革命传统的代表，获得高度评价”^③，他们作为当代诗歌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来自于解放区或延安，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参与者，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造性”相当旺盛，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的实践条件。他们除了把向毛泽东约稿作为打响《诗刊》的第一炮外，还向诗界前辈及老中青诗人征求意见。臧克家、徐迟、沙鸥以走访的形式征求了在北京的重要作家、诗人对《诗刊》的意见，这些人包括穆木天、黄药眠、何其芳、冯至、汪静之、冯雪峰、萧三等；向老舍、王统照、冰心、陈梦家等约稿。关于创刊号的封面、装帧也请艾青设计。这种办好《诗刊》的决心和用心从给毛泽东的约稿信上也有所体现：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

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在诗歌的园地里，已经显露了百花齐放、百鸟啁鸣的春之来临的迹象。西南的诗人们，明年元旦创刊《星星》诗杂志；《人民文学》、《长

①这里的新老诗人并非按年龄而言，划分的依据主要采用洪子诚的说法：“习惯上囊括了20世纪20—40年代（主要是1942年以前）发表诗作，并已获得诗界承认的那部分作者”。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②据姜明回忆：“1949年冬，《诗号角》改组，成立大众诗歌社，筹办《大众诗歌》月刊，由王亚平、沙鸥任主编。参加的诗人有萧三、俞平伯、王统照、冯至、臧克家、王亚平、艾青、田间、卞之琳、林庚、力扬、徐迟、袁水拍、严辰、邹荻帆、沙鸥、吕剑、徐放、彭燕郊等24人，其中大部分诗人担任了编委，徐迟是编委中最热心的，对《大众诗歌》的组稿、编稿、选稿等等，提出过许多有益建议。《大众诗歌》于1950年1月创刊，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诗歌月刊，共出版12期。”见周明、向前主编：《难忘徐迟》，上海书店出版1997年版，第154页。

③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载《文艺学习》1955年2月8日，第2期。

江文艺》都准备来年初出诗专号；诗歌在全国报刊上都刊登得很多。这是一个欢腾的时代，歌唱的时代。热情澎湃的诗歌的时代是到来了，《诗刊》因而诞生。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但是，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向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

我们附上那八首诗词的抄稿一份，请加订正，再寄还我们。如果您能手写一首给我们制版发表，那就更好了。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收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诗刊》是二十五开本，每版一百页，不切边；诗是单行排的，每页二十六行。在编排形式上，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在校订装帧等方面，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

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静下来要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诗刊》编辑部

主编 臧克家 副主编 严辰 徐迟 编委 田间 沙鸥 袁水拍 吕剑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①

种种迹象表明，《诗刊》的创刊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从中还可以看出《诗刊》在成立之初就表现出的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功能。一方面，《诗刊》的创立对一大群诗人发出召唤，点燃他们的诗情；而另一方面，没有资源和权力的文人只能通过与政治的亲来实现创办刊物的愿望。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徘徊就为《诗刊》的双重性品格埋下了伏笔。

二、刊物的品格

诞生于一个全新的文化体制中的共和国时期的文艺刊物相对于晚清与民国的刊物，在功能方面发生了全面转型，不再强调报刊的娱乐功能和商业动机，运作主要由党来控制，而不是放在市场中竞争。《诗刊》是由党的中宣部与作协党组掌管，它不同于《人民日报》这样的党的机关报，而是党所领导的作

^①由刘福春提供。